

马克思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种历史观视角的比较反思

刘仁营, 裘白莲

摘 要:马克思的“种族”主义尽管吸取了达尔文主义的一些思想,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的“种族”主义,不仅不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相反,它的本质和根本价值追求在于寻求从“动物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种科学探索。当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各种理论包装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尤其要把马克思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分开来,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反面功能,真正担负起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人类自由解放大方向的使命来。

关键词:马克思;“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阶级优生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2-0030-06 **收稿日期:**2009-11-09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08ZX14)

作者简介:刘仁营,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330022;裘白莲,华东交通大学讲师 330013

通常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但这种进化思想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适应于社会历史领域,在何种意义上又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会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观念对于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是十分有害的。在思想和实践中,容易引起混乱的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的基于阶级“优越”论的人类“种族”主义思想有关。因此,重新探讨马克思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澄明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的“种族”主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从内容实质来看,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并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曲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与马克思的基于阶级“优越”论的人类“种族”主义思想有关。马克思将人类“种族”主义价值追求放在“生产器官”的进化规律基础上去实现。马克思的这种基于“生产器官”进化基础上的人类“种

族”主义思想,显然受到了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启发。这一思想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集中得到阐发,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将达尔文的“自然工艺史”和他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形成史”做了一种类比,强调二者之间的某种相同性,并强调研究生产器官史,即生产力发展史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1]409-410}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是在一种整体主义方法的统摄下,对人类“器官”生产工具与动植物器官进化的类比,还没有直接涉及到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关系,但却已经在逻辑上为其做好铺垫。社会生产力、生产器官的进化,可能带来大多数人类利益的进步,也可能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为代价。我们应该“为生产而生产”,还是应该在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一个合理价值坐标基础上的通盘考虑。

其次,马克思将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即生产力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种族的利益联结起来,分析了阶级、特殊阶级、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基于“优越”阶级利益诉求的人类“种族”主义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21][25]}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决定了这里所讲的“个体”,主要不是指单个的社会个人,而是社会的阶级集合体。马克思认为社会阶级应该区分为具有“优越性”的阶级和不具有“优越性”的阶级两类,判断某一阶级是否具有优越性的标准是它与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或生产力之间的相关性。如果它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具有“优越性”,或者历史进步性;如果它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而是阻碍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不具有“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具有“优越性”的阶级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具有“优越性”的阶级必然要成为历史进步牺牲的对象。这样,历史进步的先进社会形态、先进生产力、先进阶级三者的关系就有机统一起来了。先进阶级的利益诉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进而为整个人类种族的利益提供物质准备。这一分析逻辑将个体价值目标、客观经济制约、整体价值目标做“三位一体”的通盘思考,从而走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本位主义,从相对的阶级斗争历史现象中发现了绝对的一般历史规律。

再次,在这种分析逻辑之下,马克思“历史地”肯定了李嘉图为工业资本家辩护的立场,批评了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21][25]}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利益”、“人类生产率发展的利益”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利益。而它之所以更为根本,是因为它是实现“人类天性的财富”;没有这一利益的实现,“全人类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肯定不是绝对的,而是以“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先进性为界限的。一旦超越这一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的贪婪性不再推动历史发展,而陷入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不能自拔之时,这种贪婪性就是需要批判的对象了。可见,这里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力是一种“历史的”的标准,而不是绝对的标准,全人类的发展才是一种最根本的利益,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参照坐标。

为了整个人类利益的发展,个别群体、甚至是占大多数的群体利益就要受到损害,这种历史现象和为了整个人类种族的正常进化而对弱势个体、群体、民族、种族等进行压迫或听之任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原则区别吗?马克思的面向整个人类利益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优越性”理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主义”、“阶级”优生学有原则区别吗?要厘清这种区别,就要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阶级优生学的本质。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阶级优生学

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一个内涵很不集中而外延多元化的概念。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一种政治压迫工具。对此,英国学者彼得·狄肯斯做了详细分析,他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将进化思想作为一种普适思想运用到社会科学当中,特别是运用到人性的发展当中;第二种是将生物结构理论作为一种一般方法论运用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第三种是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层林法则,作为一种共同规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三种形式分别可以称为:社会进化论意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论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压迫依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是第三种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为压迫依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内容上看,它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意义上的“优生学”。它的基本逻辑是实证分析推论出规范结论——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存在的只是优胜劣汰的现象,而且淘汰弱者、继承强者对于整个组织是有利的,那么优胜劣汰原则就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合理的。因此,面对优胜劣汰的社会现象,政府或个人就不应该采取任何帮扶救助弱者的措施,因为那样只会对整个组织进化带来阻碍。从形式上看,这种

优生学不仅是人们通常称谓的狭义的优生学,即社会个体的优生学,而且是一种社会群体的优生学。作为群体优生学,它包括阶级优生学和种族优生学两种基本形态。种族优生学又被称为“种族主义”,而阶级优生学,又被称为阶级“种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关系问题根本上也是阶级关系问题。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本质相关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阶级优生学思想。

阶级优生学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打着人类整体利益旗号,为阶级压迫和剥削提供理论辩护的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代表斯宾塞,在其《社会学研究》一书中详尽地阐发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包含四个层次:第一,工人阶级“不可能实现更好的形式”,“假如能够实现更好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么这些形式会发展壮大,会使他们认为苛严的形式消亡。这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社会结构中的“弱者”,这种身份是永恒的、无法改变的。第二,这些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不能实现,根本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人性缺陷。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不可能改变的弱者地位,是由其自身有缺陷的人性决定的,怨不得别人。第三,因为人性导致了目前的雇佣劳动制度,所以任何人为破坏这种制度的行为都是违背人性的,是必须制止的。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那么整个人类的进步就都要受到牵连。所以,斯宾塞尤其反对工人运动和慈善事业。在他看来,“工会运动的普遍政策在各个地方常阻碍能力强的人利用自己的能力获利,以免能力差的人受到损害。任何生产组合如果将这个政策付诸于行动,那么就肯定无法与以获利与发挥能力相当为原则的组合相竞争。”“以前社会制度下运用阶级权力的不如现在仁慈的那些人是邪恶的。第四,斯宾塞在做了上述可谓严密的逻辑分析后,作为最后的结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它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斯宾塞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丝毫不加掩饰,认为“现在的制度是合理的”,“以前存在的、更严厉的生产管理形式既必要又有益”,“这种似乎是他们苦难根源的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必须“容忍雇主与工人的关系”^{[3]213-232}。为了让人们“容忍”雇佣剥削劳动,斯宾塞找了许多人性、能力、社会地位上的原因,其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告诉那些“弱者”们,对于他们这种“人性和素质者,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任何改革和革命手段都对自己的利益没有好处,任何新的目标追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幻想。

在斯宾塞看来,正因为人性有缺陷的工人阶级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更高要求,所以它必然沦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但这种制度对他们的人性状况而言已经是最“有益”的了,所以工人阶级不能做出任何改变这种制度的举动,而只能“容忍”它。尽管斯宾塞在个别地方也提到人性不是一点不变的,提到随着人性的改变,工人的福利和社会地位会得到改进,甚至现存的社会制度也会因此发生改变,但斯宾塞人性论上的抽象性决定,他在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的前提下,不可能找到人性进步的现实途径。而且,他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提到这一问题,这与其资本“最优”论的核心思想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逻辑——一种追求“容忍”保守的人性怎么会成为一种变化的人性呢?一种既必然又必要的制度怎么会变得不必然不必要呢?这种几乎不可能的特殊条件下的改进,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装饰而已。所以,无论从实践还是从逻辑上,斯宾塞的理论最终只能陷入了一种抽象人性论基础上为资本主义阶级压迫辩护的境地,变成一种阶级压迫理论。

三、马克思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的“种族主义”是否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呢?这个问题与马克思对达尔文的思想及其在社会领域的运用所持的态度紧密相关。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的运用的态度,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原则肯定阶段、反思批判阶段、综合分析阶段。

第一阶段,原则肯定阶段(1860—1862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一年之后,即1860年,马克思就阅读了这本书,并提出了基本肯定的看法。他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在1861年,马克思仍然对达尔文的思想持一种类似的肯定态度。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4]156}

第二阶段,反思批判阶段(1862—1867年《资本论》出版之前)。1862年,马克思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说:“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

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5]251-252}因为马克思认识到达尔文主义的局限性,所以开始用一种反思的态度对其进行批判。1865年,他认为“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并且“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5]252}

第三阶段,综合分析阶段(1867年《资本论》出版之后)。这就是我们上述第一部分看到的结果。如果我们将上述前两个阶段与第三阶段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上述基于“优越”阶级观点的人类“种族”主义思想,其实是在前两个阶段的探索基础上的一种综合。马克思第一阶段所“原则肯定”的主要是达尔文的历史进化原则,认为这种原则在自然界和历史领域都具有适应性。但这里只涉及到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适应性,还没有将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纳入到这个理论框架中去。而第二阶段,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这种阶级社会的达尔文主义逻辑,开始用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来分析达尔文原则的运用,并开始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层林法则”。但这种分析似乎更多地是一种价值观的批判,而没有将其局限性放在一种客观历史逻辑中去分析。到第三阶段,马克思则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阶级客观性、价值局限性与历史暂时性结合起来,将先进阶级、先进生产力、先进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做了一个系统阐发。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分析问题的价值坐标和历史坐标有机统一起来了。

从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判断人性、阶级优越与否的标准完全不同。马克思判断人性优越与否的客观标准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器官的发展,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其价值标准是建立在客观标准基础之上的。而斯宾塞判断人性优越与否的立场是一种抽象的

道德或异化的技能,实质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判断标准的差别,二者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斯宾塞认为工人阶级是有缺陷的阶级,而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是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应用的先进阶级。

第二,二者对阶级对抗性及优越性的历史适用范围理解不同。斯宾塞认为阶级优生学具有历史普适性,尽管在人性进步的基础上斗争会有缓解,但不能完全消失;马克思认为阶级冲突和阶级优越性现象只是特定历史阶段,即阶级社会或“史前”社会的特殊现象,一旦超越这个阶段进入真正的“人类史”阶段,阶级及其冲突性将不再存在,也就无所谓优越阶级和非优越阶级。

第三,马克思尽管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现象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历史过程,但却并不认为在这一制度下的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压迫和剥削,而没有丝毫主体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人的敌对状态”中解读出的不是弱势阶级的社会宿命论,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社会,进入自由王国。他们都十分肯定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之前,进行经济斗争和社会经济改革是十分必要的行动。而斯宾塞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斗争,都不能完全改变人性的缺点,相反,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反而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反对和谴责。

第四,二者最终的政治结论是完全不同的,斯宾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可以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改良,但相对于人性有缺陷的工人而言,是既必然又必要的,已经是最好的社会制度了,历史已经基本上“终结”了;而马克思则恰好相反,认为资本主义导致人性的异化,但却带来了生产力这种“人类天性的财富”的发展,从而为人类解放这种最高“种族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从根本上创造了一种“更加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劳动阶级应该认识到这种历史必然性,并自觉地联合起来为自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

斯宾塞从阶级优生学推论出了阶级压迫,马克思从阶级优越性推论出了阶级解放;斯宾塞的阶级优生学是为了为阶级压迫辩护,马克思的阶级优越论是为了反对阶级压迫;斯宾塞的阶级优生学认为工人阶级是有缺陷的,必然受压迫和剥削,马克思的阶级优越论认为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其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是由经济制度导致的,所以必然获得新的自由。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种

族 优先理论,绝不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对“必然王国”的描述,对“史前时期”的承认,只是一种实证分析。他所得出的“自由王国”的结论,恰恰是建立在对“必然王国”规律的理解和自觉基础上的。马克思的这一逻辑和斯宾塞由实证分析“跳跃”为规范分析,混淆实然与应然的错误逻辑完全不同。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要么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肤浅行为,要么是一种为不良事实做辩护的恶意篡改行为。

四、反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当代形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今世界和国内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种更加精密化、隐蔽化的理论包装发挥作用。从世界史看,19世纪50年代末,“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问世就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末欧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种族主义政策的理论根据。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成为美利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0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在其《赢得西部》的著作中,丝毫不加掩饰地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北欧人种的一个分支,占领美国西部是日耳曼人扩张的继续,是一种“种族发展的历史权利”。纳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思潮的恐怖本质并开始反思。但这种反思主要限于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范围,在几乎没受其伤害的美利坚文化中,它一直以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一旦合适的气候到来,例如福利主义政策导致滞涨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以变化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变化的形式就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对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要追溯到他的精神领袖哈耶克那里去。约翰·格雷认为,在哈耶克晚年的著作中,其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在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面相上来说实为斯宾塞哲学的一种“回光返照”^[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也警告世人:在“以大鱼吃小鱼”为“原则”的时代,“你必须意识到,他们正在企图做的是推翻启蒙运动,推翻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顶峰——‘进步时代’的立法以及‘新政’的制度——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

德哲学和社会价值。他们并不试图使经济相对平等,他们也并不试图分享权力。他们的贪婪(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是无限的。”^[7]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政策结论“华盛顿共识”已经给拉丁美洲、俄罗斯、东南亚国家经济造成严重破坏,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世人越来越认清了这种思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配套的政治哲学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不同地方在于,它不再认为改良主义的宣传就能达到目标。既然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世界最好的制度,那么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强大军事来“改造”世界。对此,新保守主义的哲学鼻祖,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利奥·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好的制度有权利乃至义务去反对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实现民主。”^[8]而其重要代表克里斯托也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8]。在新保守主义政策指导下发生的美国轰炸伊拉克、阿富汗等重大国际事件,其侵略掠夺本质已经越来越为世界和美国人民所认清。

从国内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存在方式则发生了一些更加复杂的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以新自由主义形式存在,而且进行了一些主流意识形态化的包装,甚至以社会主义理论的方式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三种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上。

第一种是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作教条主义理解的观点。我们知道,马克思的阶级“优越性”理论和“种族”主义理论,在历史适用性上是有明确时间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后来因完全脱离生产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持“资产阶级先进生产力代表”论者则将这一观点庸俗化,认为中国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重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脱离生产的阶级成为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只有直接参与生产

的劳动者和管理者,才能说得上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代表。但很多人仍然置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于不顾,堂而皇之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先进生产力代表”论,这只能说明目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多么混乱。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中华总工会的座谈中重申“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对这一错误思潮的有力回击。

第二种是社会进步“必要代价”论观点。在有些人看来,既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极大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所以只要发展生产力,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剩下一条了:发展生产力。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生产力万能论,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类发展的目标自然而然会达成。而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都是必需付出的代价。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人类平等、自由的理论,却事与愿违地被歪曲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赤裸裸地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张目的思想必须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思。

第三种是鸵鸟政策式的回避劳资矛盾的观点。以劳资矛盾为核心的阶级关系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从理论和政治上解决了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阶级斗争在国际和国内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必须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企改革重组的完成,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阶层重新生成并且在政治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阶级

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并没过时,这是社会学家和统战部门都深刻认识到的客观事实。但一些管理者和学者却仍然以反对阶级问题“扩大化”为名,回避谈社会利益群体的冲突问题。这种不顾事实的鸵鸟政策已经越来越跟不上复杂多变的社会态势,这在客观上只能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帝国主义的掠夺本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为其进行理论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破坏性、压迫性越来越为世人所认识到,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真正地担负起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人类自由解放大方向的历史使命来。

参考文献:

- [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3]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韦森·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的全面挑战[J].战略与管理,2001(3).
- [7] 迈克尔·赫德森.美联储救市代表大投机:资本挤压劳工和实业[J].国外理论动态,2008(11).
- [8] 马为民.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政治哲学[J].同舟共进,2003(10).

(责任编辑:杨嵘均)

Marx's "Ethnic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U Ren-ying, QIU Bai-lian

Abstract: Although Marx's "ethnicism" has absorbed some ideas from Darwinism, the two are different in essence. Far from being a kind of social Darwinism, the essence and fundamental value pursuit of Marx's "ethnicism" is the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leading from "the kingdom of animals"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At pres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where social Darwinism remains popular in different guises, we should distinguish Marx's "ethnicism" from social Darwinism, reveal and criticiz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various social Darwinist ideas, so that we can actually assume the mission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Key words: Marx; ethnicism; social Darwinism; class eugenics